



作为一套思想操练的五四

陈平原 著



#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 陈平原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301-28761-3

I. ①作… II. ①陈… III. ①五四精神—研究 IV. ①D43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2140 号

- |       |   |
|-------|---|
| 书 名   |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br>ZUOWEI YI ZHONG SIXIANG CAOLIAN DE WUSI                      |
| 著作责任者 | 陈平原 著   |
| 书名题签  | 陈平原   |
| 责任编辑  | 张文礼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8761-3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pup.cn">http://www.pup.cn</a>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15 千字<br>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49.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td@pup.pku.edu.cn](mailto:t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 序 言

硕士及博士阶段专攻中国现代文学，自然而然，人生及学术路上，不断与五四对话。谈论小说叙事模式（《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辨析现代学术转型（《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五四当然是重要的支点。至于直接讨论新文化运动的，起码有《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Touches of History: An Entry into 'May Fourth' China*, translated by Michel Hockx, LEIDEN ·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以及《“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此外，还与夏晓虹合编过《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清点下来，很遗憾，关于五四运动，我至今没有总括性著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始终认定，“新文化”是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共同创造的（参见本书《“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这一兼及晚清与五四的思路，目前在学界仍属边缘，需打好地基，方能有大的建构。

除了收入本书的诸文，我还有若干关于五四的应景之作。说“应景”并无忏悔的意味，对于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文化/思想/政治的学者来说，因五四而切入当下话题，乃责无旁贷。因为，就像我在别处说过的，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本书所收十一文，长短及体例不一，有论文，有随笔，也有答问。只是在将五四作为思想的磨刀石这一点上，取共同立场。答问部分夹杂个人阅历与感受，明显带有主观性。可即便是专业论文，也都是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相互缠绕。若《“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与《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二文，自认颇为用力，且不无新意，可有心人照样能读出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并非立论谨严的史著，而是带有论战性质的评论。也正因此，不列参考书目（只是随文注出），也不强求体例一致。如此单刀直入，若能勾起读者对五四的兴致，进而阅读、思考与争辩，则本书“功莫大焉”。

2017年4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 目 录

i 序 言

- 1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 16 “新文化”如何“运动”  
——关于“两代人的合力”
- 49 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  
——解读五四言说史
- 78 “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  
——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
- 127 何为 / 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  
——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

- 140 走不出的五四？
- 155 兼及“思想”“文采”与“行动”
- 158 与五四对话  
——答《光华杂志》张静茹问
- 166 年长一辈应为后来者搭建舞台  
——答新华社记者任沁沁问
- 173 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播种的时代  
——答《凤凰周刊》记者徐伟问
- 185 整个 20 世纪都是五四的时代  
——答《东方历史评论》许知远、庄秋水问

##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十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说过：“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sup>①</sup>十年后重读这段话，我依旧坚持此立场。今天的主题演说，就谈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是五四；第二，风雨兼程说五四；第三，“走出”还是“走不出”；第四，如何激活“传统”。

---

<sup>①</sup> 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一、为什么是五四

晚清以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代中国人奋起搏击，风云激荡中，出现众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有的如过眼云烟，有的欲说还休，有的偶尔露峥嵘，有的则能不断召唤阅读者与对话者——五四无疑属于后者。五四运动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为何影响竟如此深远？我用以下三点理由，试图做出解释。

第一，五四运动的当事人，迅速地自我经典化，其正面价值得到后世大部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认可。有的事件严重影响历史进程，当初也曾被捧到天上，只是经不起后世读者的再三推敲，逐渐显现颓势，甚至成了负面教材（如太平天国或“文化大革命”）。五四运动的幸运在于，刚刚落幕便被正式命名，且从第二年起就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可以这么说，五四成了近百年来无数充满激情、关注国家命运、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学生的“精神烙印”。长辈们（政治家、学者或普通民众）不管是否真心实意，一般不愿意与青年直接对抗，故都会高举或默许五四的旗帜。

第二，五四运动虽也有“起承转合”，但动作幅度

及戏剧性明显不如八年抗战。不过，后者黑白分明，发展线索及精神维度相对单纯，不像前者那样变幻莫测、丰富多彩。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曾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羨不已。<sup>①</sup>

第三，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的意义是“说出来”的。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还是五四。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sup>②</sup> 有的事件自身潜力有限，即便鼓励你说，也不值得长期与之对话；有的事件很重要，但长期被压抑，缺乏深入且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与拷问，使得其潜藏

---

① 参见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5日。

② 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英译本序》，《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36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而五四运动的好处在于，既有巨大潜力，又从未成为“禁忌”。

## 二、风雨兼程说五四

历史上难得有这样的事件，当事人的自我命名迅速传播开去，且得到当时及后世读者的广泛认可。尘埃尚未落定，1919年5月9日《晨报》上已有北大教授兼教务长顾兆熊（孟余）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活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26日《每周评论》则刊出学生领袖、北大英文系学生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5月27日的《时事新报》上，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同样引人注目——“潮流”“运动”“精神”，关于五四的命名与定性竟如此及时且准确。此后，一代代文人、学者、政治家及青年学生，便是在此基础上建构有关五四的神话。

说五四不仅仅是历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六章“五四的启示”中，辨析新中国成立

后官方对五四的看法，以及诸多纪念活动和回忆文章，还有同时期知识分子的抉择与挣扎。这一章的结语很是悲壮：“‘五四’不只被看作鼓舞知识分子勇士的精神食粮，它将成为照亮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的一把‘火炬’。”<sup>①</sup>而我的《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则选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文艺报》等四种报刊，观察其在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以及八十周年时的社论及纪念文章，并将其与同时期的政治思潮相对应，看关于五四的言说如何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波、思想潜力以及道德陷阱。<sup>②</sup>

不说那些意味深长的“故事”，以我有限的阅历，也都深知聚众谈五四，一不小心就会溢出边界，介入现实的政治斗争。谈论李白、杜甫孰高孰低，或者评说《金瓶梅》《红楼梦》的好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太多联想的——“文化大革命”除外；可说五四就不一样了，因相互误读或有心人的挑拨，随时可能由平和的

---

① 参见薇拉·施瓦支著、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352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② 参见陈平原《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读书》2009年9期。

学术论争一转而成了激烈的政治对抗。关于1999年纪念五四的书刊及会议，我在若干小文中略有涉及<sup>①</sup>，实际状况比这严重得多。以致2009年4月23—25日我在北大主办“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认真吸取十年前的教训，从时间到议题到人员的选择，都仔细斟酌，可还是一波三折。外面的人只晓得北大与五四运动关系密切，有责任扛这个旗子；不知道北大为了这个“责无旁贷”所必须承担的风险。<sup>②</sup>可仔细想想，没什么好抱怨的，为什么人家选择在谈论五四的会议而不是唐诗研究或金融会议上说大话喊口号呢？可见五四这个话题本身天然具有“政治性”——你想躲都躲不开。

近百年中国的风风雨雨，让我辈读书人明白，谈论五四，不管你是沉湎学问，还是别有幽怀，都很容易自动地与现实政治挂钩，只不过有时顺风顺水，有时

---

① 如《〈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书屋》1999年6期；《在学术与思想之间——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书城》2010年12期。

② 参见陈平原《〈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序》，见王风等编《重回现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文本——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对话历史——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则难挽狂澜。去年秋天，我选择在进京读书三十年这个特殊时刻，盘点零篇散简，凑成一册小书，交给北大出版社，约定今年春夏推出，以纪念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杂志《新青年》（1915—1926年）创刊一百周年。<sup>①</sup>当时绝对想象不到，会撞上如此“新文化研究热”。今年一年，我先后接到十多场纪念五四或新文化运动学术会议的邀请；其中，北京大学最为“立意高远”，准备年年纪念，一直讲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一百周年。

如此大规模纪念五四新文化，背后推动的力量及思路不一样，有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只是盲目跟风，但我相信其中不少是深思熟虑的。官员我不懂，单就学者而言，之所以积极筹备此类会议，有专业上的考虑，更有不满近二十年中国思想界之日渐平庸，希望借谈论五四搅动一池春水的。

---

<sup>①</sup> 参见陈平原《〈“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序》，《“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三、“走出”还是“走不出”

如何看待早就沉入历史深处、但又不断被唤醒、被提及的五四，取决于当下的政治局势与思想潮流，还有一代人的精神追求。1993年，我曾撰写题为《走出五四》的短文，感叹“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至今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sup>①</sup>；可十六年后，我又撰写了《走不出的“五四”？》，称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左还是右，是激进还是保守，都必须不断地跟五四对话。<sup>②</sup>从主张“走出”到认定“走不出”（后者虽然加了个问号，实际上颇有安之若素的意味），代表了我对五四理解的深入。

促使我转变思考方向的，除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专业著作，还包括“五四老人”俞平伯的诗文以及我前后两次赴台参加五四学术研讨会的直接感受。

1949年5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俞平伯、叶圣陶、宋云彬、何家槐、王亚平、臧克家等

---

① 参见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第69—74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年。

② 参见陈平原《走不出的“五四”？》，《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15日。

文化名人纪念五四的文章，此外，还有柏生的《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在采访记中，俞平伯的回答很有趣：五四新文化人气势如虹，想做很多事情，“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因此，这好比是三十年前的支票，如今总算兑现了。<sup>①</sup>又过了三十年后，也就是1979年，俞平伯撰《“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十首）<sup>②</sup>，除了怀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再就是将“四五”比拟“五四”，称“波澜壮阔后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的诗后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比起许多政治人物的宏论，我更认同诗人俞平伯的立场：曾经，我们以为五四的支票已经兑现了；其实，当初的“浮慕新学”与日后的“竹枝渔鼓”，均有很大的局限性。

1999年4月我赴台参加政治大学主办的“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接受《中国时报》记者

---

① 参见柏生《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人民日报》1949年5月4日。

② 此组诗初刊《文汇报》1979年5月4日；又载《战地增刊》第3期（人民日报出版社，1979年5月）时，改题《“五四”六十周年纪念忆往事十章》，文字略有改动。



采访，谈及台湾民众为何对五四不太感兴趣，对方的解答是：“因为我们已经跨过了追求民主科学的阶段。”当时我很怀疑，因为这很像1949年俞平伯“支票终于兑现了”的说法。2009年我赴台参加“五四文学人物影像”开幕式及相关论坛，发现年轻人对五四的兴趣明显提升。之所以会有如此变化，除了各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讲授外，还与普通民众不再盲目乐观有关。我曾对照海峡两岸关于五四的想象与阐释，既看异同，更注重相互影响：

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在如何看“五四”的问题上互相影响。台湾影响大陆的，是对激进主义思潮的批评，尤其不满“五四”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大陆影响台湾的，是新文学不仅仅属于温柔且文雅的徐志摩，必须直面鲁迅等左翼文人粗粝的呐喊与刻骨铭心的痛苦。<sup>①</sup>

这里说的主要是文学与思想，实际政治比这复杂多了。但不管怎么说，轻易断言我们已经走出五四的“余荫”

---

① 参见陈平原《“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北大学子的“五四”记忆》，《光明日报》2010年5月4日。